

日本國體的遠景

白爾奧著

陳英和譯

譚汝謙編

「日本學」叢書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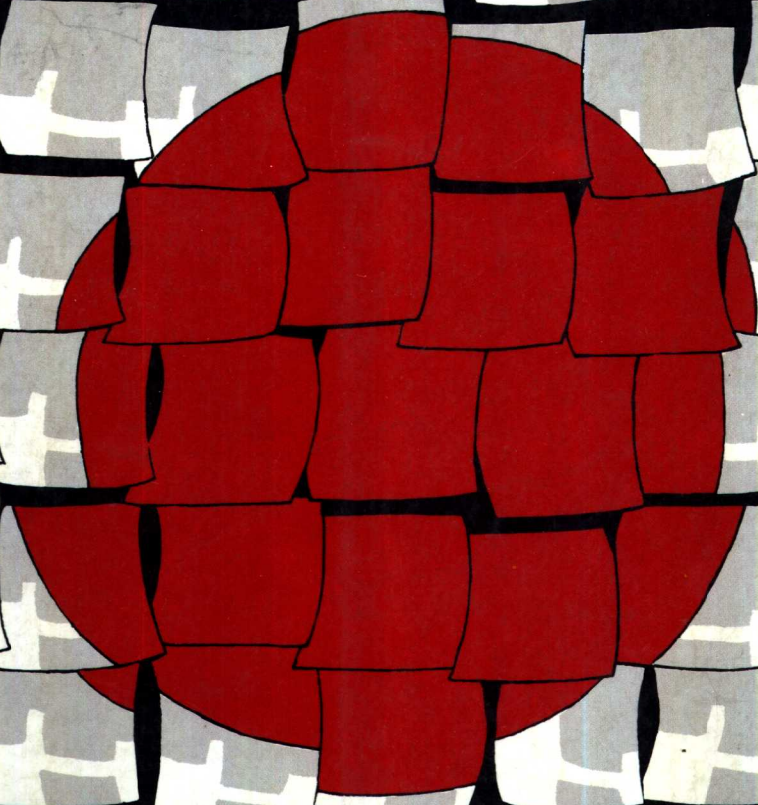
日本國體的遠景

——經濟大國的苦惱與自省

白爾奧著 陳英和譯

譚汝謙編

「日本學」叢書 1



12
6
40

日本學叢書 譚汝謙主編

日本國體的遠景

——經濟大國的苦惱與自省

白爾奧 著
陳英和 譯

廣角鏡出版社

書名：日本國體的遠景

作者：白爾奧 **譯者：**陳英和

編者：譚汝謙

出版：廣角鏡出版

香港澳仔莊士敦道195—7號八樓 電話：5-753877

發行：華風書局

香港澳仔莊士敦道184—6號 電話：5-749495

承印：太平洋（永航）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1984年3月版

定價：港幣20元

書號：ISBN 962-226-056-X

日本學叢書緣起

「日本學」(Japanology或Japanese Studies)是以科學的態度和方法探討日本事物和社會文化的學問。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一門學問在世界各地備受重視。尤其是在美國，很多大學開設「日本學」課程，培訓研究日本的專才，不少中學也教授日本語言及日本歷史文化的科目；最近，甚至有些工商機構及政府部門設立不定期的「日本學」特別班，供在職的員工進修。歐洲、澳洲、加拿大各地也急起直追，大力發展日本研究。西方人士逐漸承認，在某些科技和工商業的範圍內，的確是「日本名列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近年，東南亞各地更掀起了「日本熱」，尤其是星馬泰的政治、工商、教育各界領袖，喊出「向東看」(Look East)的口號，以日本為現代化建設的榜樣之一，改變素來向西方一面倒的態度，「日本學」亦因而發展起來。

中國是日本的近鄰，二千年來雙邊關係非常密切，甚至產生「同文同種」的誤解。事實上，中國是世界「日本學」的鼻祖。一千六百多年前，西晉的陳壽(233-297)撰寫了〈倭人傳〉(收於所著《三國志》中的《魏志》)，一般認為是日本史最早的文獻，比日本人自己編撰的第一部日本史書《古事記》(712)還要早四百多年。

可是，「日本學」在中國不受重視，和其他科學一樣，在漫長的歷史中裹足不前。其間雖有非常出色的「日本學」著作，但亦未受到廣泛的重視。例如，清末黃遵憲(公度、1848—1905)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前十年(1885)便完成的巨著《日本國志》(四十卷、五十餘萬言)，直到甲午戰後才能公開刊行，使當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某高級官員，發出「此書早布，省歲

幣二萬萬」的浩嘆。

被迫割讓臺灣和賠款二萬萬兩銀子之後，國人始紛紛留學日本，至1937年抗戰軍興止，四十年間留日學生不下五萬之數，蔚成中國史上空前的留學運動。國人又大量翻譯日書，受到社會熱烈歡迎。軍政、文教、實業各界人士赴日考察研修，絡繹於途。而日本熱心人士來華充當專業顧問或興辦文教及社會福利事業者，亦為數至衆。總之，近百年來，日本帝國主義者不斷侵略中國，導致「大日本帝國」覆亡，使中國遭逢空前禍害，撫之尚有餘痛，但兩國文化始終交流不絕。推算起來，留日學生、日書翻譯、乃至通曉日本語言的人才，世界各國之中似以中國為數最多；若論「日本學」的人力資源，中國應該名列第一。

不幸得很，「日本學」在戰前的中國並沒有長足發展。在數以萬計的留日學生之中，潛心探究日本文化的罕如鳳毛麟角。喏大的中國，在第二次大戰前，竟然連一間日本研究所也沒有，芸芸大專院校的課程中也沒有像樣的「日本學」科目。最不幸的是：有些人只是到日本一遊，參拜過一兩所徐福廟，回國後便著書立說，自欺欺人，冒牌的「日本通」滿街走。直到九一八事變之後，在「救亡」的感召下，才出現「日本研究會」（南京）之類的團體，發刊「日本研究叢書」，較為認真地系統地譯介日本社會文化。如果說中國是對日本事情最無知的近隣，似不為過。

中國「日本學」的不長進，原因相當複雜，最重要的是「大中華意識」作祟。國人多以為明治維新（1868）前的日本，一切都是中國的翻版，一切「盡在吾家所有」，不值得勞師動衆去探究；又誤以為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一切都是西洋的翻版，借助於日本去汲取西洋文明只是一時權宜之計，並無深意存焉。加上日本成為中國頭號大敵，欺凌中國無所不用其極，引起中

國人極大的反感，「日本學」的不振，當然是不難理解的了。

戰後，日本經濟高速發展，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間成為世界經濟大國，其成就使舉世為之側目；在國際事務上，日本又步步為營，邁向國際化，與我們的經濟和文化關係越來越密切。因此，臺灣海峽兩岸和港澳地區的「日本學」漸次發展起來，很多大專院校都開設「日本學」的課程，日本研究所也漸次出現，日本語成為僅次於英語的第二外國語，日本事情亦是社會大眾極度關心的對象之一。工商界、文教界、青年學生、乃至政府領導人，大都重視日本，實是求是，對於有關日本事情的中文圖書需求甚殷。

我們和香港廣角鏡出版社合作編刊這套「日本學叢書」，旨在為讀者提供深入淺出的讀物，使能分享世界各地專家學者探討日本事情的成果。我們並不以為「日本學」就是「學日本」，就是轉販「日本製造(Made in Japan)」的發財致富術。日本的確有不少地方值得我們借鏡和學習，我們應該虛心地向日本請益求救。但「學日本」只是我們的目的之一。

我們的叢書有兩項任務。第一，探索日本富強的根源，從宗教、思想、政治、經濟、社會、文藝、科技、學術等角度，考察日本成功的奧秘。我們亦希望藉此觀照我們自己的弱點，促進我們自己的進步。我們的心情有點像梁啟超對黃公度所發的詠嘆和牢騷：

中國人寡知日本者也。黃子公度撰《日本國志》，梁啟超讀之，欣懌詠嘆：黃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強，賴黃子也。又慙憤責黃子曰：乃今知中國，知中國之所以弱，在黃子。成書十年，久謙謀不流通，令中國人寡知日本，不鑑、不備、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日本國志後序〉，1896年）

我們同意梁啟超的見解，「知日本之所以強」便可以幫助我們

「知中國之所以弱」，同時促使我們更能「鑑」——鑑察和參考日本的長處，更能「備」——防備日本的再侵略，更能「患」——憂慮重踏日本的覆轍，更能「悚」——恐懼永遠落在日本後頭。因此，我們不忍再見優良的「日本學」著作在中國「久謙讓不流通」。

第二，促進中日友好和交流。本叢書不但嘗試剖析日本文化和制度，而且打算探索日本人的思想、情感、歡愉和苦惱。住在面積比英國大、比東西德加起來還要大的國度的一億二千萬隣人，和我們一樣都是有血有肉有靈性的人，其社會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其所思所感有高貴的一面，也有卑污的一面。我們希望深入了解他們的好惡，關懷他們的苦樂；在必要而適當時刻，甚至向他們提出忠告和警告，就像我們對待親友隣里一樣。只有互相了解和互相關懷，才能談友好和交流，而友好和交流是維護東亞乃至世界和平的最佳法門，又是千百年來中日人民真正的意願。

爲了達成上述兩項任務，我們除出版有關日本事情的著譯之外，也會編刊探討日本與香港和中國的關係的書籍。由於目標大、題材廣，各書的篇幅不可能劃一，該厚的厚，該薄的薄；風格方面，該嚴肅的嚴肅，該輕鬆的輕鬆。我們不計較體面和排場，只想盡情開放象牙塔，盡心爲中國富強和中日友好貢獻綿力。

我們的才識有限，盼望同道先進不吝賜教支援，也期望讀者批評督導，以便知所改進。

主編 譚汝謙 謹識
香港中文大學日本史教研室
1984年3月

譯者序

自196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以驚人的高速發展而傲視世界。此後十年間，解釋日本成功的文獻，充斥書坊。到了1979年，哈佛大學社會學家伊茲拉·沃格爾(Ezra Vogel)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把這種「成功文學」帶到了極峯。對西方的近代日本研究而言，這本書可說是一個新起點。沃格爾除了把日本推許為「第一」以外，同時也把許多西方的日本研究者的眼光，拉到當代日本的各種問題上。沃氏的見解，引起學者不同的反應，那些認為他的論點過於武斷的學者，除却在書評裏商榷他的看法之外，開始對日本當代歷史的發展及其問題，作較深入的觀察與研究。本書就是這種新努力的成果之一。

本書原題為The Future of Japanese Nationality: An Essay in Contemporary History，譯自Journal of Japanes Studies 第8卷第2期(1982)，頁223—263。原作者對近年來日本人對其國家將來在世界上應擔當何種角色的一場爭論，作了整體的分析，並檢討了爭論中的主要言論及其代表人物；對這場爭論與日本歷史發展的關連及其在今天之意義，提出了令人深思的精闢見解。在目前日本國內處於大變之勢，戰後以來執言論界牛耳之進步派勢力漸趨式微，反之，右派勢力日益抬頭，軍國主義幽靈伺機還魂的情況下，本書對了解彼邦人士現在如何理解他們國家的將來，頗有價值。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原文中nationality一詞在本書中之意義，最貼切的中譯應是「國體」。但是在歷史上，「國體」一詞曾於1930·40年代被日本極端國家主義者利用來鼓吹戰

前的天皇體制。幾經考慮之後，本書中譯仍用「國體」，其意義為「國家體制及國民性之特點」，祈讀者注意。

本書中譯，由華盛頓大學陳學霖教授倡議，翻譯過程蒙原作者多次解答疑難，譯文復蒙陳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譚汝謙先生及楊久誼同學修飾教正，謹此一併致謝。譯文錯誤，當由譯者負全責。

陳英和

中譯本序——致中國讀者

1930年代的歷史告訴我們，日本國內政治與中美兩國人民都有極大的利害關係。日本國內政治鬥爭與辯論的結果，對我們兩國都會有重大影響。今天，新條件與新態度正在促使日本人對日本在國際舞台上該扮演何種角色作出檢討。戰後數十年來，日本在世界上的角色，是戰勝國強加於它的政治秩序與日本戰後政治領袖們的精明、務實政策的結果。作為一個商業民主國而避免涉觸於國際事件的這種角色，一直獲得民間一致的支持。然而，在1980年代，日本未來的角色已經成為日本國內外爭論益熾的題目。在日本國內①經濟上的成功帶來了對本國能力廣大的、新的自我肯定與信心②另一方面，國際環境的變化，則給予日本經濟力量一種新的意義與重要性。法國外貿部長米雪爾·祖巴(Michel Jobart)於1982年感慨地說：如果沒有蘇聯和日本，世界將會多麼和平寧靜！簡言之，日本的經濟力量已經逐漸被視為對現存世界秩序有擾亂與挑戰的可能。因此，新的情勢正迫使日本人重新考慮一向指導其戰後外交政策的原則。

我希望這本小書在中國會像在美國一樣，能夠引起讀者的興趣。中美兩國必須繼續密切注視日本人議論他們在國際上未來角色的發展。

承蒙編者譚汝謙博士、譯者陳英和先生以及同事陳學霖教授等大力襄助，使本書能與中國讀者見面，謹此一併致謝。

白爾奧

1984年2月7日

於美國西雅圖市華盛頓大學

白爾奧 (Kenneth B. Pyle)

美國約翰霍金斯大學哲學博士，現任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系教授兼傑克遜國際研究學院院長，是日本近代史、近代思想史及社會史專家，又是西方主要「日本學」學報《日本研究學報》(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創辦人兼主編。主要著作有《明治日本的新一代及其文化認同問題》(The New Generation in Meiji Japan: Problems of Cultural Identity, 1885-1895)(1969)及《近代日本的形成》(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1978)等專書及論文多種。

陳英和 (Ying-wo Chan)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畢業，現為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日本史博士班學生，研究清水幾太郎等人的思想與影響。

譚汝謙 (Yue-him Tam)

香港新亞書院畢業，先後在日本京都大學及東京大學研修，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日本史專業，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主要著譯有《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1980)、《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1981)、《中國人留學日本史》(合譯、1982)等專書及論文多種。

本書析論七十年代日本人對日本「國體」——日本國家性格及其文化特色的研討。作者指出，隨着戰後在經濟上飛躍的成長，日本人廣泛地意識到日本處於新的環境，因而在內政和外交上都出現新的態度。四種主要思想流派，即進步派、自由・現實主義派、重商主義派和新民族主義派，正在展開大辯論，摸索日本未來的出路。這些流派之間雖有互不相容的地方，但大體上對日本文化傳統充滿信心及感到自豪，因而都肯定在文化價值和制度上，日本比西方更適合發展成為工業社會，而且具備資格在世界事務上擔當更重要的角色。

目 次

日本學叢書緣起	譚汝謙	1
譯者序	陳英和	5
中譯本序	白爾奧	7
一、前言		1
二、日本國家的不協調性		13
三、新環境與新態度		27
四、全國性的大論爭		43
(甲) 進步派		44
(乙) 自由・現實主義派		49
(丙) 重商主義派		53
(丁) 新民族主義派		60
五、結 論		77
編者的話		81
參考文獻目錄		86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Readers	Kennt B. Pyle	92

一、前 言

在當代國際秩序中，日本比任何國家展現出更多獨特的不協調性。長久以來，日本人異常關注他們的獨一性和特殊性格，而他們不尋常的戰後歷史，為這種自我反省的慾望提供了大量新材料。日本人乃至非日本人同樣為日本國體的矛盾和佯謬感到迷惑和昏亂。當今日本最不協調的一面，在於它龐大的經濟力量及隨之而來的自我肯定、與它的政治孱弱及因此造成的自我懷疑之對比。

誕生於世界近代歷史上最多災多難的事端之間，日本的戰後秩序注定是獨特的；它必然是所有民族國家概念的特例。它必須為一個精神破碎的民族——在戰爭中喪失將近三百萬人（包括原子時代的首難者）、全國奮鬥追求的工業和帝國全被毀滅了、在國際上受排斥、在歷史上第一次被外國軍隊佔領——建立起一個

新的國體觀念。

在劇變的情勢下，日本目前正在重新檢討戰勝國強施於它的國體觀念。因此，對於彼國能以異於一般的國家模式而繼續生存的信念，越來越成為論爭的主題。本書是對近年來日本人對其戰後秩序及其將來在世界所扮演的角色的全國性爭論的探研。



圖1 投降前東京市中心區景像——1945年8月初旬，經盟軍長期密集轟炸之後，「大日本帝國」的首都玉石俱焚，頹垣敗瓦隨處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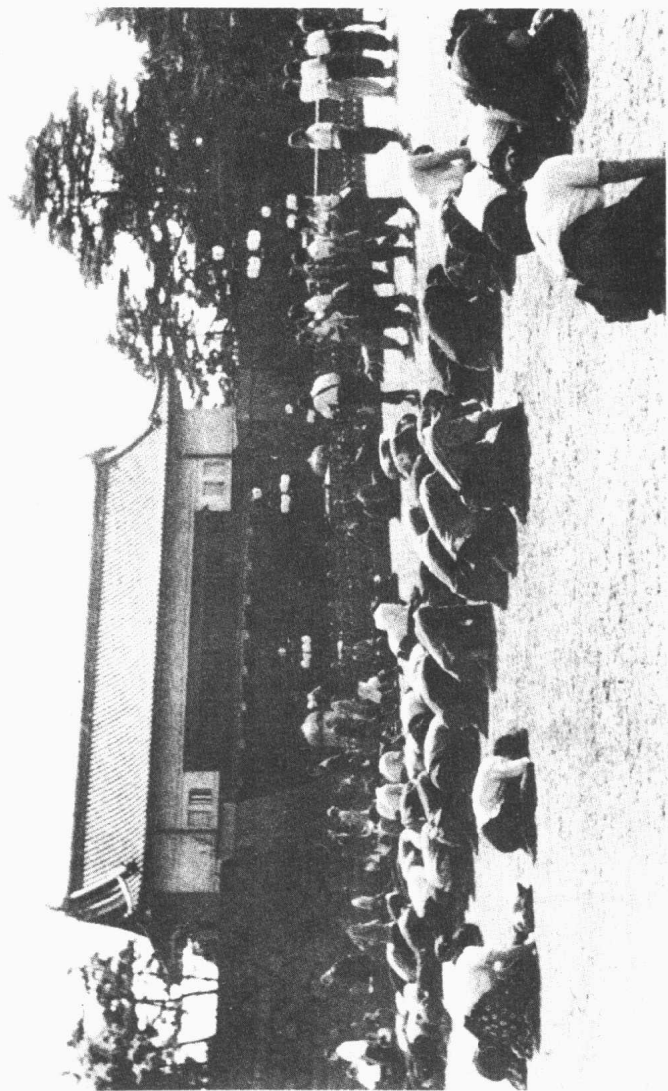


圖2 投降時日本皇宮廣場景像——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在廣播中宣佈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後，一羣日本婦女在東京皇宮二重橋前的焦土上飲泣，長跪不起。